



LUOTUO  
CONGSHU

● 骆驼丛书

# 周作人概观

舒芜·著

中国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# 周作人概觀

舒  
芜·著

# 周作人概观

舒芜著

责任编辑：周楠本

\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\*

198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63,000 印张：3.875 印数：1—4,370

书号：10109·2038 定价：0.80元

新书目：86—10

## 题 记

以前有人给别人的书写序言，写得太长，无法用作序言，只好独立成为一本书，那是名人名作，我何敢妄拟，可是我这本小册子产生的经过，却是差不多。原是为本周作人散文选写序言，写成一稿，字数超过正文的三分之一，实在不好意思印上去。如果在这篇的基础上删节，又会弄得非驴非马，大概写法根本不对路，需得从头另外写过。而这篇另自成为一个格局，已经简而又简，无可再简，正好让它作为一个小册子印出来。我还想照着这个思路再写几篇，现在先以概要问世，早日求得各方面的指教。

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，舒芜记于北京。

周作人是谁？今天中国青年读者恐怕不少人答不上来；有些人能答出一点，大概也只说得他是鲁迅的弟弟，也是个作家，很不争气，堕落成了汉奸，如此而已。如果告诉他们：周作人在“五四”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，后来虽然暗淡了，但是，左翼作家当中眼光深远的，对他的学问文章仍然给以很高的评价。据周建人回忆，抗战前不久，冯雪峰还表示过这样的意思：“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，鲁迅去世后，他的学识文章，没有人能相比。”〔1〕后来，抗战爆发，周作人留在沦陷了的北平，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出处，郭沫若在上海发表了深情怀念周作人的文章，引用古诗“如可赎兮，人百其身”，说是只要周作人脱险南来，“比如就象我这样的人，为了掉换他，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。”〔2〕可是，五个月后周作人就辜负了这些关心，背叛了祖国，而郭沫若当时正是冒险从日本潜回祖国来参加抗战，为爱国青年所敬仰的。今天的青年听到这些情况，恐怕吃惊不小，将信将疑。其实，这都不是太远的事，文艺界八十岁以上的老

前辈们，都亲身经历过周作人的名字闪闪发光的时代。

那么，是不是要责怪青年对历史的无知，和极左文艺思想对历史的歪曲呢？当然二者都是事实，但是，还有另一个事实：周作人的确在祖国呼吸存亡之际，背叛了祖国，背叛了受难的人民，这是无可原谅的，不能不受到惩罚的。一代两代青年忘记了他，或者只知道他的罪恶和丑恶，这个惩罚对于他是轻了还是重了，都很难说，反正一切咎由自取，只该他自己负责。人民不可侮，历史不可欺，而历史的无情的规律不一定都是通过人民的明智和公平，有时反而是通过迷乱和偏激，曲曲折折地体现出来。

然而，历史又是有情的，公正的，这也常常是一个“曲线中的直线”的进程。近些年来，研究周作人的论著陆续发表了，周作人的历史功绩逐步透露给青年读者了，周作人作品的选集也开始公开出版了。大概，一个历史人物如果既有无可原谅的罪，也有不容抹杀的功，那么两方面的账，都会一笔一笔记在历史的大账本上，一时之间可能只有某几页被揭开，另几页被掩住，但是迟早总会一页一页翻开，来一番总清理，哪一笔也漏不掉，错不了。

周作人这一本账，现在看来是可以动手清理

的时候了。这是很值得做的。因为周作人的身上，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，不了解周作人，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。鲁迅的存在，也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，不了解周作人，也不可能了解一个完整的鲁迅。至于周作人的悲剧，则是和中国文化传统、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，不了解周作人，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，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。

周作人这本账又是很不容易算的。它太复杂了，太矛盾了，随便一想就是一大堆的问题。周作人的一生是联贯的，还是截然两段呢？截然两段的事当然不会有，那么，互相联贯的前后两个时期，是非功罪为什么这样相反呢？是前面有假，还是后面有冤呢？是先前侥幸成名，还是后来偶然小误呢？是无可理解无可论证的奇人异事，还是从错误到罪恶、从脱离人民到背叛祖国的完全说得清的发展呢？对于周作人的历史功绩究竟应该怎样估价呢？估高了，会不会同后面一段更加矛盾，更加难以解释呢？会不会减轻了他后来的罪恶，冲淡了人们的义忿呢？估低了，又怎样解释他当时在青年心目中的形象的辉煌，怎样解释在他尚未背叛祖国之前，革命作家们一直

还给他以崇高的评价呢？周作人究竟怎样走上背叛祖国的道路，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呢？怎样在他前段历史里寻找根源，作出科学的说明呢？还有，探讨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？是仅仅具有历史的认识的意义，还是为当前的文学和文化事业继承一份不应该拒绝的遗产，为现实的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呢？

这样一大堆问题（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），要想一个一个都解决好，不是短期间做得到的。现在只能在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上，作一些初步的探索；其实还不是探索问题本身，只是探索一下怎样解决好问题的态度、尺度和角度。

## 二

究竟怎样来估价周作人的历史功绩，是首先要碰到的问题，或者说是我们今天研究周作人问题的一个前提。历史上的汉奸有的是，其中也不乏先前有过某种光荣历史的，他们都没有多少好研究的，至少不需要作为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大问题来研究。而周作人问题却是这样的大问题，正因为他在我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有过很大的历史功绩，否则这个研究根本就不必要了。

上面说过，一代两代青年忘记了周作人，那是



他自取之咎，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对周作人的全盘否定，也未尝不是历史的正义惩罚之曲折的体现。这当然不是说忘掉他的历史功绩就是科学的态度，不过是说这种不科学的态度仍然曲折地体现了历史的正义罢了。今天已经是新的时期，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该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忿怒很好地结合起来，“以忿火照出他的战绩”。〔3〕近些年来，有关周作人的研究论著当中，逐渐敢于肯定周作人的历史功绩了。这是应该的，也是必然的。但是，有些文章肯定得很犹豫很保留，似乎周作人不过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运动的一名普通参加者而已，这当然不符历史事实。有些论著作了犹豫保留的肯定之后，立刻又加上许多否定，例如说他的立场还是自由资产阶级的，世界观还是个人主义的，理论武器还是人道主义的，等等，说这些就是他终于堕落的根源。姑不论这些说法是否完全准确，即如所说，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，思想属于这一套体系的人还多得很，他们绝大多数后来都随着时代而进步过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有的老作家，从来密切追随周作人，同样留在沦陷了的北平，与周作人一直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，但并没有追随他陷入叛国的泥沼，以后也是随着时代而进步，直到而今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可见这些抑扬之论，不仅不能解决问题，而

且也没有绕开问题，其用心自有不得已之处，大家都会理解，但是显然不是今天所需要的科学态度。

现在需要的是，对周作人先前的历史功绩，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，要肯定个够，不怕承认他在“五四”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，都是当时最高的水平，没有人超过他，没有人能代替他。

关于周作人的多方面的贡献，阿英曾有一个概括的评价：“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干部之一的周作人，在初期，是作为文艺理论家、批评家、以至于介绍世界文学的译家而存在的。他的论文《平民的文学》（1918）、《人的文学》（1918）、《新文学的要求》（1920），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文学上的主张，对于当时的运动，也发生了很广大的影响。批评方面，《自己的园地》（1922）一辑，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基础石，同时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‘学衡派’批评家的封建思想。《沉沦》《情诗》二评，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，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。说到介绍，从最初的《域外小说集》，到《点滴》、《现代小说译丛》、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、《玛加尔的梦》、《陀螺》等成册的作品的翻译，是更足以证明他对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，曾经贡献了怎样巨大的

力。但是，到了一九二四年以后，他的努力与发展，却移向另一方面——小品文的写作，这以后周作人的名字，是和‘小品文’不可分离的被记忆在读者们的心里，他的前期的诸姿态，遂为他的 小品文的盛名所掩。”〔4〕阿英的概括，很得要领，我们再补充一个方面，即文化思想和文化评论方面，就更完整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只有补充了这一方面，其它各方面才贯串得起来，周作人的历史功绩的突出之处才看得清楚。

周作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提出“思想革命”的口号，文化思想上的问题是他一直看重的。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，介绍外国文学思潮，讲外国文学史，目的都是为了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。他号召青年要学习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怎样接受欧洲文艺思潮的榜样，“这并不是将‘特别国情’做权衡来容纳新思想，乃是将新思潮来批判这特别国情”。〔5〕他提出著名“人的文学”的理论，是为了反对封建的非人的文学。他以大批评家的权威站出来支持郁达夫的《沉沦》和汪静之的情诗，是为了打击伪善的礼教。后来他写出大量的小品文，成就之所以那么高，影响之所以那么大，就因为他善于用小品文来宣传某种文化思想，进行某种文化批判，不管他是在讲草木虫

鱼，在论鬼神道佛，在谈东西学问，在评古今文章。他说过：“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，如或偶有可取，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。”〔6〕他这是以思想家自居，也正是事实。他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功绩，正因为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，才高出于当时的一般的水平，也才能够成为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。

下面我们比较具体地看一看周作人在各个方面究竟有哪些历史功绩？突出之处何在？给我们留下哪些遗产？我们何以不该拒绝？

### 三

周作人最早是作为翻译家出现的。一九一八年一月，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一号上发表周作人翻译的论文《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》（英国W. B. Triter作），这是他在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心阵地上的第一次出阵。以后各期常有他的译文。第四卷第五号上，他发表了新文学运动中所作的第一篇论文《读武者小路君所作的一个青年的梦》，仍然是评论外国文学的。其实他从事翻译工作还早得多，他参加新文学运动之前，已经译出了三十四篇外国短篇小说，七部中篇小说，广泛阅读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著作。

正是在这个底子上，一九一七年他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，编出了中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讲义，这也是他参加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行动。后来大约直到一九二一年左右，他的写作工作仍以译述为重点，所译的欧洲和日本小说，小诗，散文，分别编为《陀螺》、《冥土旅行》、《狂言十番》、《空大鼓》等集出版，当时都成为广大文学青年的精神食粮和看向外界的窗口。

周作人的翻译工作，首先是一种启蒙工作，用鲁迅《摩罗诗力说》中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求新声于异邦”的工作。古老中国当时的闭塞蒙昧状态是可惊的。周作人自己在南京当学生的时候，已经渴望冲破这种闭塞和蒙昧，是当时阅读新书籍最多，接受新思潮最早的一类学生。可是他后来回忆当时“所受到的文学的影响，也就只是梁任公的《新小说》里所载的那些，主要是焦尔士威奴的科学小说，以及法国雨果——当时因为用英文读法称为器俄的名字，此外则是林琴南所译的哈葛德等，后来有司各得，其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比较的有点意思。”〔1〕他所接触到的外国文学还是这样贫乏狭窄，一般读书人的更加孤陋寡闻，可想而知。又过了十来年，“文学革命”的口号已经提出来之次年（一九一八），情况仍然没有很大变化，周作人回忆道：“除却一二种

节译的小仲马《茶花女遗事》，托尔斯泰《心狱》外，别无世界名著。其次司各得、狄更斯还多，接下去便是高能达利，哈葛得，白鼯拜（Buothby）无名氏诸作。”<sup>〔8〕</sup>周作人在这样闭塞的环境里进行翻译工作，其所以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，不仅由于他选取的原作的广泛性系统性，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有新的文学观念，新的审美标准。

在周作人之前，林纾是中国第一个大量翻译外国小说的人。他使闭塞的中国读书人知道，西洋人不仅是船坚炮利，不仅长于声光电化，而且也还有这样好的文学，这个启蒙之功是不可没的。晚清的觉醒的青年，包括青年时期的鲁迅、周作人兄弟，都经过热爱林译小说的一段。<sup>〔9〕</sup>但是，林纾仍然是个封建文人，没有什么新的文学观念，新的审美标准。正如周作人所说：

“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它，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它有我的长处，因为它象我的缘故。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，就因为它象史汉的缘故，正与将赫胥黎《天演论》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。”<sup>〔10〕</sup>加以林纾的译文用的是桐城派古文，更不足以显出异邦新声的特色。周作人的翻译工作，从他在日本与鲁迅合作译《域外小说集》时代起，观念就完全不同。鲁迅写的《域外

小说集序》里，明言他们的目的是要使“异域文学新宗，自此始入华土”，引进异的新的，就是他们共同的观念。

这种观念体现在翻译的态度上，也体现在译文上。关于周作人的翻译的态度，胡愈之曾经说：“像周作人氏那样谨慎，忠实，勤恳，把译书当作一种专门事业做的态度，是我们译书的人所应该取法的。”<sup>〔11〕</sup>关于周作人的译文，钱玄同说得更具体：“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，照原文直译，不敢稍以己意变更。他既不愿用那‘达旨’的办法，强外国人学中国说话的调子，尤倍屑象那‘清室举人’的办法，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。我以为他在中国近来的翻译界中，却是开新纪元的。”<sup>〔12〕</sup>那两种办法，前复音者（主要指他译得最早影响最大的《天演论》，后者指林纾。林、严二人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深度相差很远，但是，他们的译文还是中土之旧声而非异域之新声则是一样的。（严复后来的译文与初期不同了，那是后话。）周作人的译文完全打破了林、严的旧套子，力求显出“异域文学新宗”之异在何处新在何处，钱玄同说他在中国翻译界中开新纪元并不过分。

周作人的功绩还在于，他把他讲授欧洲文学史当中的内容，以及他在有关外国文学的其他方

面的广泛学识，用优美的散文写成大量介绍评论文章，贡献给读者。试以被阿英称为“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基石”的《自己的园地》一集为例，其中评价外国文学的文章就有这些篇：

《神话与传说》、《歌谣》、《谜语》、《论小诗》、《情诗》、《〈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〉》、

《〈王尔德童话〉》、《〈你往何处去〉》、《〈魔侠传〉》、《法布尔〈昆虫记〉》、《〈歌咏儿童的文学〉》、《〈俺的春天〉》、《儿童剧》、

《儿童的书》、《三个文学家的纪念》（舒芜案：指佛罗倍尔、陀思妥也夫斯基、波特来耳）、

《席烈（舒芜案：今通译雪莱）的百年忌》、《森鸥外博士》、《有岛武郎》、《日本的讽刺诗》、《希腊的小诗》。单是这些篇目就可以想见，在那个闭塞的时代，周作人是怎样努力于外国文学信息的输入了。

周作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开拓读者的眼界，他是用这些材料来构成他的文化思想，用这些做尺度来进行文化批评，往后我们会看到对神话、童谣、生物学等等的研究都被他用作他的思想的基石，支持了他一生的思想。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，他把译述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同他的关于“人的文学”的理论联系起来。他说：“因为人类的命运是同一的，所以我要顾虑我的命



运，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命运。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，不能分中外。我们偶有创作，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，其余大多数都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，扩大读者的精神，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，养成人的道德，实现人的生活。”〔12〕从人道主义和大同主义的高度来阐明翻译介绍工作的意义，不能不说是当时别人都未达到的水平。

#### 四

作为翻译家的周作人出现之后不久，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的周作人又出现了。

新文学运动发难之初，陈独秀明确提出：要推倒贵族的、古典的、山林的文学，建设平民的、写实的、社会的文学。这个提法本来很深刻，涉及了文学的几个根本问题。可是他解释这两种文学的区别，仅仅在于一是“雕琢的阿谀的”，“陈腐的铺张的”，“迂晦的艰涩的”，另一个则是“平易的抒情的”，“新鲜的立诚的”，“明丁的通俗的”，都只是从文学语言的技巧风格上着眼。而且连这些也没有在当时文学理论上发生很大影响。陈独秀的口号和解释之间的差距，表明历史的限制是很有力的，任何思想家都难免受到它的影响。当时讨论得最热烈的还